

## 身残志不残的学界楷模

——记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和教授

■ 布凡 贺兰



条。就这样一直坚持着和大家一起劳动。一天,天旋地转,陈晓和昏了过去,被战友们抬进了医院。这一去就是半年,医院的出院报告上写着:“脊椎骨严重变形,胸12到腰1、2中等度压缩性骨折,左盆右耻骨联合骨折分中,部分劳动能力丧失”。陈晓和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其身体条件已不适应紧张的部队生活,军队和地方医疗部门建议其提前退出现役。

安庆,长江边一座古老的城市。陈晓和被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录用,当上了一名园林工人。而与他同期入伍的几名战友一年后荣归故里,都被安排在公安局、银行和邮电系统。强烈的反差,只能让他慨叹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人生没有不平等!”这是19岁的陈晓和贴在床头的座右铭。陈晓和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很快就让他崭露头角。1976年,安庆市一些新建中学师资力量短缺,在全市选调教师,陈晓和悄悄地报了名,并在层层筛选中脱颖而出,被安庆十五中录用。他开始相信,人的命运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报到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校领导看他太年轻,加上身体还有残疾,说话也不敢让他上讲台,只能把他暂时安排到长期亏损的校办工厂。可出人意料的是,3个月后,陈晓和成了生产线上的负责人。他为厂里制定了当时相当少见的计件工资制,没想到这一招竟然使长期亏损的校办工厂扭亏为盈。

陈晓和的能干,引起了校领导的注意,他们把他调到初二年级当班主任,并负责全年级四个班的政治课教学。过硬的军人素质使他从未经过师资培训的他在教师岗位上毫不逊色,而且更加出色,他在全市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自己做班主任工作的经验体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陈晓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边忙于教学,一边紧张地复习迎考。几个月后,陈晓和如愿以偿地迈入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大门。

不久,陈晓和又萌发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勤奋刻苦再次助他攻克了人生新的堡垒,顺利地跨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涉足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与人合作出版了第一部专著。1986年7月,被授予哲学硕士学位的陈晓和面临着新的选择。故乡向他招手,导师向他抛来留校任教的绣球,几所著名国企给他开出高薪……可是,他心中始终难以割舍那份浓浓的军旅情结,他的一份来自部队的函件一往情深……慎重地选择了海军指挥学院。

## 二、为胜任敢于奋力一搏

他面对的学员,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高层次高素质军事指挥员。透过世界军事风云和未来海上战场的浓浓硝烟,他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肩负着神圣使命的军队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教会学员练就宏观思维和微观思辨的本领,把军事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生性倔强的陈晓和没有因身体伤残而接受任何照顾。可现实生活中,他要克服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啊!他的工作量严重超负荷。可他却却在拼搏和强撑中寻找着快乐。

1991年夏天,他带着科研课题到部队见学,由于劳累过度,腰伤复发,整天大汗淋漓,心跳衰缓,但他一直支撑到见学结束才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得的是极易造成猝死的病毒性心肌炎!伤病对他而言是弱小的,击不倒他,摧不垮他,只能激活他更加昂扬的斗志。

1988年,一场罕见的洪灾袭击安徽,在老家休假的陈晓和自告奋勇参加了抢险队。身体单薄瘦弱的他连续50多个小时坚守在护堤现场,顶着暴雨,在洪流中抢运物资,扛麻袋。他一阵阵呕吐,食物吐完了,吐血,吐胆汁……人们只知道他是一名军人,有着健康人一样的体魄。

1997年6月13日,一个平常的日子。课堂上,他按照惯例,给学员留下了讨论

和自由提问的时间。“海见一位学员突然发问:“教授,我想咨询一下,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是否意味着海空军的战略地位及作用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军事战略学问题,陈晓和一下愣住了。他是一个军事迷,可面对这么专业的问题,他竟然一时语塞。

学员那失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他。尽管其中还有许多包容和谅解,但仍然叫他无法承受。一种久违的愧疚难以抗拒地在他心底滋生、膨胀,越来越强烈。他甚至无法继续剩下的课程……他痛苦地在一个个失眠的夜晚煎熬自己。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军队武器装备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使战争日益成为智力和能力的较量,他深切地感到,在军队从事哲学教学,不懂军事,就很难从根本上帮助学员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解决军事斗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研究中的问题。

尽管他算得上是一个“老牌”硕士生,可他却称自己是个“土包子”,在外语水平、电脑技能和军事理论素养方面,都有不少欠缺。与近年来不断崛起的“新生代”教员相比,他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感叹英雄迟暮、江郎才尽。

人们发现,陈晓和明显地憔悴了。他在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准备后,毅然决定报考海军战役学博士研究生。这一年他44岁,是他今生仅有的一次考博机会。

当时陈晓和是“海军最高学府最年轻的教授”,先后获海军指挥学院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学质量奖、海军优秀课程二等奖和学院一等奖,并获“海军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又是多么巨大的压力呀!临考前的几个月,他每天连午饭都不敢吃,因为吃午饭就会引起条件反射要午睡。就像劳碌已久的蚕蛹对破茧成蝶的期待一样,在喜讯传来的一刹那,陈晓和觉得自己那么幸福地飘了起来,能够用最强壮的躯体站立并足以俯视一切,有了一颗最能飞翔的心。虽说一天军事也没学过,可他却成了令人羡慕的海军战役学博士研究生。

昨天是功名成就的哲学教授,今天,却成了万事开头难的军事学博士生。陈晓和感到万象更新,自豪地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一定要成为我军最优秀的军政复合型高学历人才!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将自己既懂哲学、又懂军事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紧盯着眼代战争最前沿、最热点的问题,在两门学科的结合部进行交叉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1年5月,南京半山园。一个高层次的小型座谈会。陈晓和小心翼翼地走进海军指挥学院院办会议室。他是仅有的两名博士学员代表之一。时任海军司令员石云生上将就坐在对面。

他向首长汇报的是未来封锁与登陆作战的战法选择问题。他那独到的观点、新颖的分析、犀利的视野、精彩的论证,让人如临其境。人们哪里知道,这位头发稀少、面容清瘦的大校学员,正式学习军事才仅仅一年。

司令员对他的发言有点惊讶,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然后,从座谈代表名单中找到了“陈晓和”这个名字,意味深长地对院长苏士

亮、政委张仁忠说:“你们学院的高学历人才素质不错,这种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2002年7月,陈晓和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军事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政复合型高学历人才。

## 三、为使命跨界再创辉煌

2004年10月,陈晓和从海军指挥学院科研部转业到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成了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其人生的又一次蜕变。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筹划着整个学科的发展。作为博士生、硕士生和博士后合作导师,他在确立研究方向、研究导向、研究框架、任务分工、督促指导、定稿把关等方面倾注了全部心血。

由于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得当,效果比较理想。在优化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面,他们主持完成了2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1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在军民融合方面,由于发表的论文数量多、被引用率高,陈老师和其博士王安家康、纪建强分别进入了全国军民融合核心作者前30强榜单。在国防经济安全方面,他们出版《国防经济与国防安全》、《中国国防经济安全研究》、《外国国防经济安全研究》和《中外国防经济安全比较研究》共4部专著。更为可喜的是,万方网上一共有15篇国防经济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9篇是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写的,而这中间又有8篇是陈晓和导师的博士生完成的。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的评价,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分专业排名2007年位居全国第一。

迄今为止,陈晓和一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20余部,完成各类课题60余项。其中,《关于确定事物发展周期起终点的原则标准问题》、《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分析》、《国防支出效率的测算及国际比较》分别被《新华文摘》、《财经研究》、《财贸经济》等权威期刊刊登和转载;《薛海·经济学卷·国防经济词条》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政策法规对民用飞机产业发展的影响》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联合作战系列问题研究》为全军军事科研“十五”计划重大课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效能比较研究》和《国防经济资源保障绩效研究》分别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转业14年来,陈晓和先后开设了国民经济动员学、装备经济学、中国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军费理论、4门博士课程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现代国防经济学、国防工业经济学3门硕士生课程,教学工作量在所在单位是最重的,但其三门课程考评优秀。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成功举办8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分别进行了报道。由于工作成绩突出,陈晓和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军队转业干部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万花丛中,一只美丽耀眼的彩蝶在振翅奋飞。

## 我国债务问题不应被整体化

■ 廖群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前一段穆迪与标准普尔相继下调我国的主权评级,两个主要依据,一是经济增长将持续放缓,二是债务率过高。第一个依据的脆弱性已为近来我国经济日益企稳所证明。第二个依据似乎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如果对其进行认真、客观与科学的分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我国的债务率,笔者一年前左右在“信报”发表文章指出,若按债务总额/GDP比率指标衡量,国际清算银行对2015年9月底我国债务率的测算结果是249%,其中,政府债务率40%,家庭债务率39%,企业债务率170%。按照这一指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与家庭债务率都显著偏低,但企业债务率明显过高。文章又指出,以企业债务总额/GDP比率衡量的企业债务率过高的必然性成因之一,是我国第二产业(工业+建筑物)占GDP比重高于其他国家,而第二产业正是需要大量融资的产业,债务率大大高于第一与第三产业。所以我国以企业债务总额/GDP比率衡量的企业债务率过高,部分地归因于我国的经济结构特点,而并不一定表明我国企业真实的整体债务水平过高。

这其实意味着以债务总额/GDP比率这一债务率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债务水平的非科学性与其失真性。从概念上来讲,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债务,一个是生产总值,相隔较远且分属两个统计系统,二者直接相比欠缺数学上的严谨与科学性。更重要的

是,这一直接相比过于简单,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将导致债务水平评估的失真。上面提到的经济结构因素致使我国企业债务水平估计过高就是例证。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企业的债务水平,最直接与清晰的指标就是这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即该企业的债务总额/资产总额比率。那么如果要衡量一群,如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所有企业的债务水平,最直接、清晰与科学的指标就是这些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即这些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加权平均)或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都是存量,且同属一张资产负债表而高度相关,二者相比数学上严谨,概念上清晰,加权平均或中位数也好理解并为广泛使用的数学概念。这样,准确而不会出现失真问题。

那么使用平均资产负债率或资产负债率中位数指标来进行衡量,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如何呢?让我们用数据说话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5.8%,处于国际上公认的50-60%合理区间的中端而与60%的国际警戒线还有较大距离,说明内地工业企业的整体债务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工业企业高。

同时,2016年我国所有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水平为43.0%,而2014年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水平分别为50.23%、56.67%、48.86%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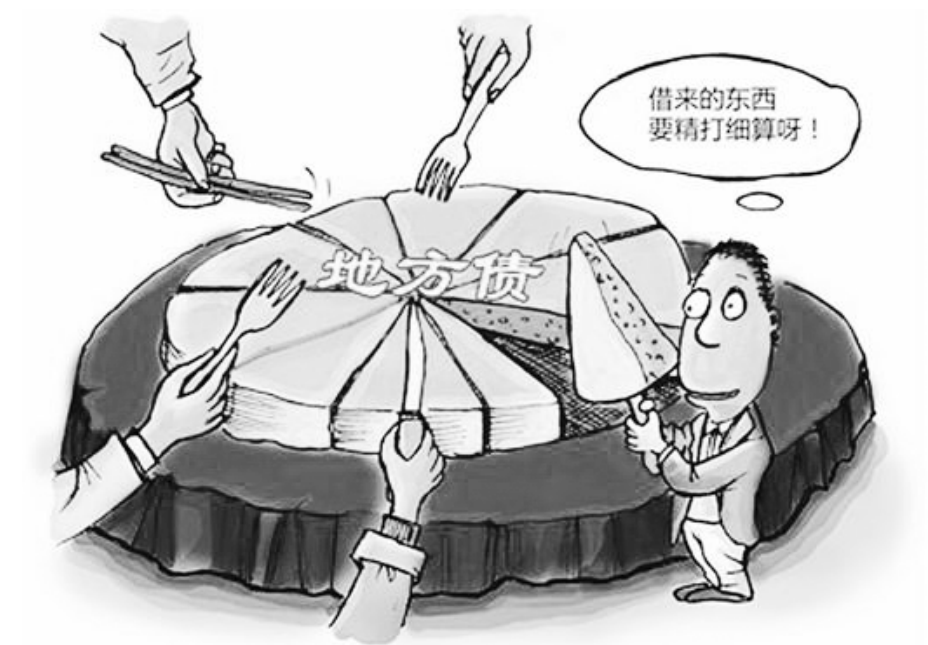
44.37%。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实际上还较主要发达经济体上市公司的债务水平为低。

还有,2016年中国3000家最大企业与全球30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3.7%与63.5%,相差无几。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在200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但此后下降并趋稳,并在近几年随去杠杆化而有所降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从2005年的57.8%降至2015年的56.6%,再降至2016年的55.8%。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变化也呈现了同样的趋势。

基于上述数据与分析,我国企业整体的债务水平被高估了,企业债务问题被夸大了。因而,那种认为我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已严重影响整个企业界与国家的信用,甚至将导致债务与金融危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穆迪与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第二个依据,即债务水平过高,也与第一个依据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在债务水平方面没有问题。结构性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首先,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偏高。2015年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1.94%;2016年中央国有上市企业与地方国有上市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1.97%与60.26%,均超过60%的警戒线。第二,部分行业的负债水平过高。2016年房地



产、钢铁、煤炭、建筑装饰、公用事业等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0%,交通运输、通讯、汽车等行业的则接近于此。最严重者为产能过剩的钢铁与煤炭行业,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68.1%。三是部分省市的企业债务水平高企。2016年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省份包括河北、辽宁、山西、福建、广东、重庆、云南、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其中,山西与云南超过70%。

以上我国企业结构性债务水平过高的问题如继续发展将引发结构性债务风险并阻碍相关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不可忽视而须

努力解决。即,去杠杆是完全必要的,应该加速推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整体的负债水平可以高估,结构性的债务问题可以夸大整体性的。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所在,性质、范围与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精准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又不产生误击。因而,认识到我国企业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而非整体性的,将有利于保持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应有的信心,更重要的将使得政策当局能够更加精准地确定今后经济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